

語言地理學與歷史學的跨領域互動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退休教授

洪惟仁

uijinang@gmail.com

1. 解釋性的語言地理學

語言地圖的繪製是語言地理學的主要工作之一。不過，這不是說一定要繪製地圖才算是語言地理學研究，只能說地圖繪製是呈現語言地理學研究成果的最好手段；也不是說語言地圖畫出來了，語言地理學的研究就算大功告成了。

Chomsky(1964)提出語法研究的「三層次妥當性」(three levels of adequacy)理論。運用到語言地理學來，對於個別的地區，能夠正確觀察或調查出語言或方言的分佈，可以說達到了「觀察的妥當性」(observational adequacy)；能夠根據正確的觀察或調查資料，把語言或方言分佈的實況繪出精確的地圖，可以說達到了「描寫的妥當性」(descriptive adequacy)；但是只有能夠解釋語言或方言所以如此分佈，才可以算是達到了「解釋的妥當性」(explanatory adequacy)。

地圖繪製之後，更重要的工作是要對語言或方言的分佈狀態進行所以然的解釋，說明語言分佈狀態為什麼會這麼分佈，追究語言或方言所以如此分佈的歷史過程。這方面的研究可以分為兩種取向：

- 一、從語言分佈的表面進行語言地理學的分析；
- 二、從地理條件與歷史文獻進行跨領域研究。

語言地理學在中國一直都不受重視，所繪製的語言地圖多半不正確或不精確，並且只有描寫性的地圖。在這方面最大的成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編的《中國語言地圖集》(1987)以及曹志耘《漢語方言地圖集》(三卷)(2008)的問世。但都止於對中國境內的語言及漢語方言之分佈進行宏觀的描寫。

解釋性的研究最早是橋本萬太郎(1978; 1981)，他從東亞語言地理學的大格局對漢語方言的變體分佈提出解釋。周振鶴、游汝傑(1986)從歷史考證的觀點對一些詞彙，特別是表現南方原住民族的詞彙或地名之分佈進行解釋。周振鶴《現代漢語方言地理的歷史背景》(1996)對於漢語方言的分佈大勢從人口遷徙的角度進行解釋。

岩田禮最近發表的《漢語方言解釋地圖》(2009)及《續集》(2011)匯集了大量的漢語方言材料繪製成兩冊的漢語方言地圖，並且從地理方言學的觀點對每一個詞彙變體的分

佈發展提出解釋。這是唯二具有解釋性研究的地圖集。

台灣的語言地理學雖然起步很早，但是因為戰爭中及戰後長期的斷層，直到 1990 年代民主化後才復興起來，但多半是描寫性的研究，有關語言地理學的解釋性研究比較少，尤其是有關方言變體的分佈的（地理方言學的）解釋性研究特別少，但也有幾篇作品進行了語言地理學的或地理方言學的解釋性研究。

李壬癸一系列作品從語言地理學以及歷史考證的觀點研究台灣各原住民族的分佈、遷徙路線以及擴散源（原鄉），並認定台灣是南島民族的原鄉。

洪惟仁自 2005 以來發表的一系列地理語言學作品，不但以繪製台灣以及各地區的語言方言分佈圖，並從語言地理學以及歷史考證的觀點對各語言或方言所以如此分佈提出解釋。

語言地理學雖然有自己的理論，不過這些理論都只有洞察力而沒有證明力。語言地理學的解釋及科學的論證終究要和其他的學科進行跨領域合作才行，需要合作的學科包括普通語言學、歷史語言學、方言學、語言類型學、社會語言學、地理學、歷史學、民俗學...等。本文討論台灣語言地理學與歷史研究的互動及其研究成果。

2. 語言地盤發展的歷史解釋

根據我們的研究語言地盤的發展，或者說語言地理分佈狀態變化可以分為兩種類型。

1) 插入型：新的語種或語言變體（以下合稱「新語」）插入原本的語種分佈區或語言變體分佈區（以下合稱「舊語」）內。

2) 包抄型：原本的語種分佈區或語言變體分佈區（以下合稱「舊語」）由包圍其他的語種或語言變體（以下合稱「新語」）變成被包圍。

從靜態的、共時的表面分佈狀態，這兩種類型都是 a-b-a 的分布，也就是 a 語包圍 b 語。問題是 "b" 到底是新語還是舊語？如果 "b" 是新語，那麼這樣的發展類型屬於「插入型」，如果 "b" 是舊語，那麼這樣的發展類型屬於「包抄型」。

那麼如何判斷 "b" 是新語還是舊語呢？本文認為共時的地理語言學沒有辦法提出正確的判斷，必須依賴跨領域的研究互相印證。以下從地理語言學與歷史學的跨領域互動為例，舉例說明。

2.1 插入型發展論的理論及其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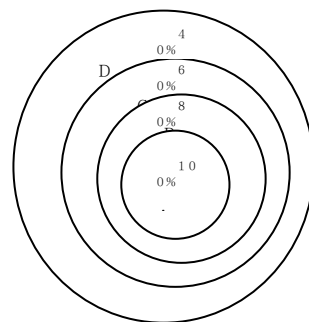
插入型的語言地理分佈發展論早在十九世紀古典的地理語言學時代就已經被提出了。以下先以兩個語言分佈的解釋為例，再來討論理論問題。

2.1.1 語言傳播的模式：施密特的「波傳論」

施密特（Johannes Schmidt 1843~1901）1872 年提出有名的「波傳論」（wave theory/wallentheorie），這個理論認為新形成的變體由一個點開始向周圍擴散，其過程可以比喻成投石於水，水波由落石點向外擴散，形成同心圓狀的水波。

「波傳論」如右圖【附圖 1】「施密特的語言波傳模型」所示，新興的形式由中心的 A 向周邊 B→C→D 的方向擴散。

這個理論方便說明「插入型」模式發展的過程，是所有插入型發展論的基本理論模型。同時他也可以解釋所有沿地面發展模型，包括插入型與包抄型。



2.1.2 柳田國男「方言周圈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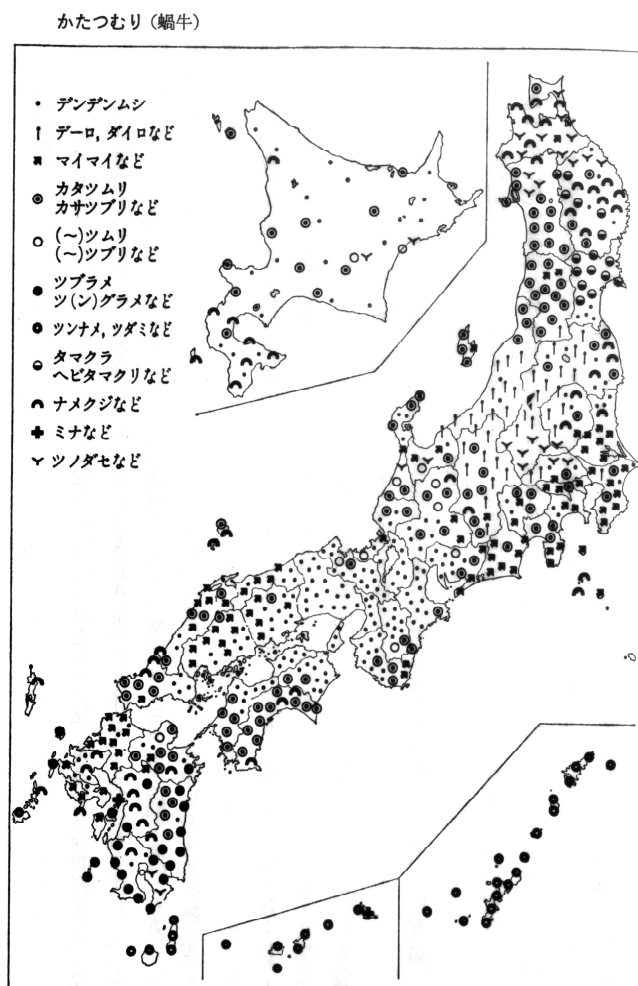
日本柳田國男提出有名的「方言周圈論」。柳田在所著《蝸牛考》（1930）將「蝸牛」方言變體分為 5 類，發現這 5 類變體的分佈呈現這樣的分佈狀態：

A - B - C - D - **E** - D - C - B - A

實際的分佈如下圖所示¹：

【附圖 1】施密特的語言波傳模型

資料來源：李仲民繪製，引自李仲民博士論文 2009：208



【附圖 2】日本「蝸牛變體分佈圖」

資料來源：德川宗賢《日本の方言地図》（1993:15）

¹ 柳田國的「方言周圈論」及「蝸牛」變體分佈圖及其說明參見德川宗賢(1993:14-20)，2】根據文部省《日本言語地圖》（1974）重新調查整理的 3 張地圖加以範疇化重繪。

E 是京都方言，東京、廣島附近方言是 C，北海道和九州方言是 A。柳田國男考證各種變體的歷史，發現 E 是近畿產生的新變體，由 E 往外層層擴散，越遠離近畿，保存著越古老的變體。

柳田國男因此提出有名的「方言周圈論」，主張「古語殘存於邊境」，也就是說方言地理變異，周邊一致性的變體是存古的，中間不一致的變體是後來插入的新形式。

把以上的概念抽象化，可以作這樣的假設。假定有三個鄰接的聚落排列成這樣的順序：

A — B — C

如果這三個聚落屬於同一個語言或方言，其語言變體的分佈成這樣的狀態：

a — a — a

三個聚落的方言是一致的，也就是說成同質性變體成連續分佈，這沒有問題。但是如果方言變體形成這樣的分佈狀態：

a — b — a

周邊方言一致，而中間的方言不一樣。這樣的非常態分佈狀態違反了語言連續性原則，柳田國男判斷 b 是新語，而 a 是舊語，這就是「方言周圈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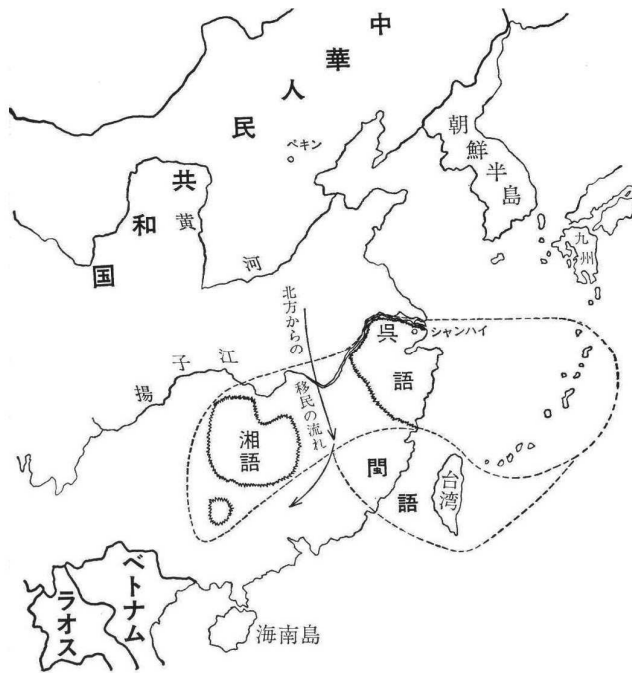
柴田武（1969:32）接受了柳田國男的「方言周圈論」，並且作為他語言分佈理論的第二原則「周邊分佈原則」。柴田採用了「原則」的術語，是否恰當，留待第 3 節討論。

2.1.3 橋本萬太郎的贛、客、粵語插入論

受到「波傳論」及「方言周圈論」的啟發，橋本萬太郎（1981:348-352）就中國的湘語和吳語有三元對立，中央地帶的贛語、客語、粵語只有二元對立的分佈狀態，判斷贛語、客語、粵語是插入的語言。北方移民南遷沖破南方三元對立聲母的連續體的分佈狀態。總之認為後者是因北方移民潮插入的新語，而前者是原本的南方漢語。²橋本的「贛、客、粵語插入論」如下圖（【附圖 3】）所示。

橋本萬太郎（1981:348-352）大概是日本語言學家利用「方言周圈論」解釋漢語分佈僅見的實例。不過，雖然橋本的解釋是合理的而可信的，橋本只是根據語言地理學理論所進行的「推論」，並未進一步做跨領域的「論證」。

² 閩語雖然也是南方漢語，但是閩南語沒有濁音，依照本文作者的解釋這是閩語和北方漢語的平行演變。至於閩南語雖然也是三元對立，但橋本（1981: 351）已經指出，閩南語的濁音是由鼻音變來的，濁音是新興的變體，和本文討論的全濁清化是兩回事，所以不能算是「三元對立」的類型。



第55圖 3項対立の地理的ひろがり

【附圖 3】橋本萬太郎「三維對立的地理擴散」

資料來源：橋本萬太郎《現代博言學》（1981:350）

歷史學研究上，周振鶴的《現代漢語方言地理的歷史背景》（1996）可以作為橋本（1981）「贛、客、粵語插入論」的註腳。這篇論文簡要地論述現代漢語各大方言形成的年代，南方漢語最早形成的吳語（周初即開始萌芽於太湖流域）；接著是湘語（即楚語，戰國時期萌芽於湖南）；閩語萌芽於東漢。西晉永嘉亂後，北方漢族移民至江淮之間，萌生了江淮官話和西南官話。江西的贛語則遲至唐天寶十四年（755）發生安史之亂以後北方移民大量移入才萌芽的，而唐末黃巢之亂和北宋末年靖康之亂逼使贛人南遷贛南，而萌芽了客語……。周文總結客贛語的「插入」說：

「在江西北、中部，北方移民帶來的語言形成了今日贛語的主要基礎，並為日後客家話的形成準備了條件。進入江西的移民語言像楔子一樣，把吳語區和湘語區永遠分隔開來。」（周振鶴 1996: 73）

這段話正和橋本（1981）的「贛、客、粵語插入論」不謀而合，也就是說語言地理學和歷史學的研究做了完美的互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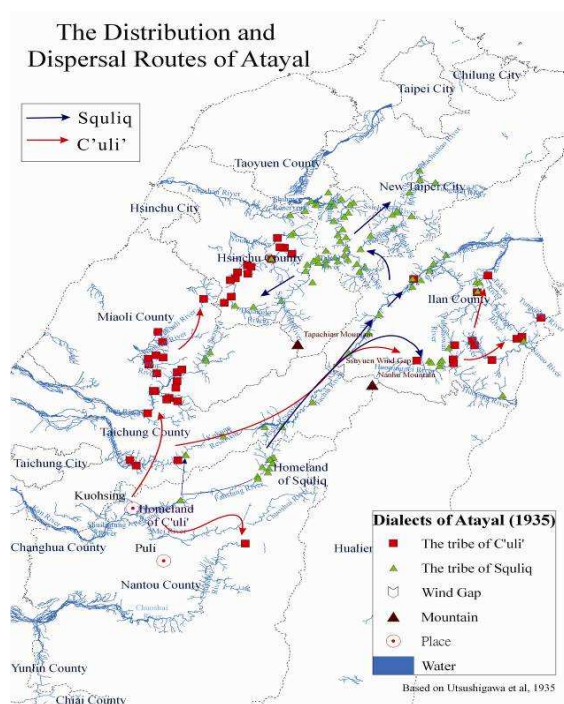
2.1.4 李壬癸的泰雅語 Squliq 方言插入論

泰雅語有兩大方言，Ts'oli'方言分佈在五峰西部、泰安鄉、仁愛鄉北部山地以及南澳鄉、大同鄉的四季村，相當於泰雅語分佈區的邊緣地帶，而中心地帶及北部的尖石、烏來則是 Squliq 方言的分佈區。分佈大勢是 Squliq 被 Ts'oli'所包圍。

李壬癸據此分佈狀態，從語言地理學的立場推斷 Ts'oli'人北遷比 Squliq 人早，李壬癸

(1997: 94) 指出：「大約十八世紀中葉，泰雅族從現代分佈的西南端（今南投縣仁愛鄉境內）一波一波地向北和向東遷徙。……向北擴散的泰雅再進一步分裂為澤敖列和賽考力克，前者遷徙的時代較早，而且大都分布在邊緣地區，而後者的遷移是相當晚近的事，其地理分佈最廣。」（李壬癸，1999: 35）遷入宜蘭的時間，大約 1754 年左右 Ts'oli' 人先遷入；大約 1820 至 1850 年 Squliq 人才遷入（李壬癸，1996: 192）。

李壬癸所以並不是單純從語言地理分佈的表示狀態就能作此判斷，而是根據馬淵東一（1954），而馬淵東一又是移川子之藏等（1935）的作者之一。根據他們所做的泰雅族家族遷徙調查顯示，Ts'oli' 比 Squliq 更早遷徙到現在的分佈區，Squliq 是一種插入的「新語」。我們根據移川子之藏等(1935)等的調查重繪如下圖：



【附圖 4】泰雅族方言分佈及其擴散圖

資料來源：本圖為作者重繪。部落分佈根據移川子之藏等《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1935），遷徙路線則根據原作的採訪紀錄，排除矛盾的傳說加以合理的重建所繪製。洪惟仁（2011）。

由上舉的兩個例子可以顯示，無論是橋本萬太郎的「贛、客、粵語插入論」或李壬癸的「泰雅語 Squliq 方言插入論」在提出解釋時都具備了地理語言學的「洞察力」。但是如果沒有歷史的印證，其解釋不一定能夠成立，因為除了「插入型」還有「包抄型」的發展類型。

2.2 包抄型發展論及其解釋

語言地理分佈的發展方向不一定是由內而外，也可以是由外向內，也就是「包抄型」的發展類型。這一節介紹另一種發展類型：「包抄型」。

2.2.1 包抄型發展論：洪惟仁的「洪水論」

洪惟仁（2010）、Ang（2011）認為把語言特徵的傳播看成水波只是一種比喻，這種比喻比較溫和，可以解釋語言特徵或詞彙的地理擴散的初期狀態，但不能描寫激烈的語言戰爭所產生的語言地盤變動。

兩種語言如果在地理上互相隔絕，不同的民族間語言也不接觸，則語言之間不會發生競爭，更沒有戰爭，語言地盤會保存在一個穩定的狀態，相安無事。但是當語言互相接觸，一定會發生競爭，語言的勢力會分出高下，然後語言地盤開始發生變動。一個插入的語言，如果競爭力夠強，其語言地盤可能越來越擴張，逐漸發展成包圍弱勢語言。相對的，弱勢語言越來越萎縮，甚至走向消亡的命運。這樣激烈到你死我活的競爭，其實已經不能叫做「語言競爭」（language competition），而是「語言戰爭」（language war）了。

語言戰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其摧枯拉朽、排山倒海的力道好比洪水氾濫，絕對不是「波傳論」的波浪所能比喻。洪惟仁（2010）和 Ang（2011）把語言殘酷的戰爭所引起的語言地盤變動用「洪水」來比喻，謂之「洪水論」（flood theory）。

他把連續性的原始語言分佈狀態比喻成低地面，新興的語言或新形式看成是大雨之後的洪水。當大雨滂沱、山洪爆發的時候，低窪地帶發生洪水氾濫，橋斷了、路不通了，低窪地淹沒了。就洪水開始造成地面斷裂時，相當於「插入型」的初期發展階段；而當洪水繼續暴漲，淹沒面積慢慢擴大，沒有淹水的高地越來越小，然後一個一個的高地變成一個一個的孤島，最後完全被洪水吞沒。

「插入型」的語言，如果競爭力夠強，大力擴張地盤，就可能像洪水氾濫一樣，發展成「包抄型」的語言。我們把這種語言地盤擴張發展的現象叫做「洪水效應」。

「洪水論」解釋了包抄型的語言地盤的發展。

2.2.2 東歐拉丁語被包抄論

Bloomfield 在 *Language*（1933）舉出一個東歐發生的包抄型發展模式。【附圖 5】「東歐拉丁語分裂圖」顯示屬於拉丁語系的羅馬尼亞孤立於拉丁語系的分佈區之外，和意大利之間發生斷裂，而被芬匈語系的匈牙利語以及波蘭、俄羅斯、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的斯拉夫語系語言所包圍。

從羅馬尼亞的地理位置來觀察，按照「方言周圈論」所主張的「古語殘存於邊境」的解釋，羅馬尼亞應該是插入的新興語言才對。可是 Bloomfield 根據史實說拉丁語系的語言本來是連續相接的，因為中世紀斯拉夫語的入侵，接著，九世紀匈牙利語的入侵，才造成羅馬尼亞和拉丁語系的分佈區斷裂。總之，從羅馬尼亞與斯拉夫語系的關係而言，並不屬於「插入型」，而是一種「包抄型」的發展模式：羅馬尼亞被斯拉夫語系語言以及匈牙利語所包抄了。換言之，分佈在羅馬尼亞周邊的語言不是「古語」而是「新語」。

Bloomfield（1933）並沒有如柳田（1930）主張語言空間分佈關係可以斷定是「古語」或「新語」，只是根據歷史事實指出語言空間分佈的發展模式有「插入型」和「包抄型」

兩種類型而已，我們也是採取這個立場，認為所謂「方言周圍論」只能歸類為「插入型」的發展模式，而其相反的模式為「包抄型」。



【附圖 5】「東歐拉丁語分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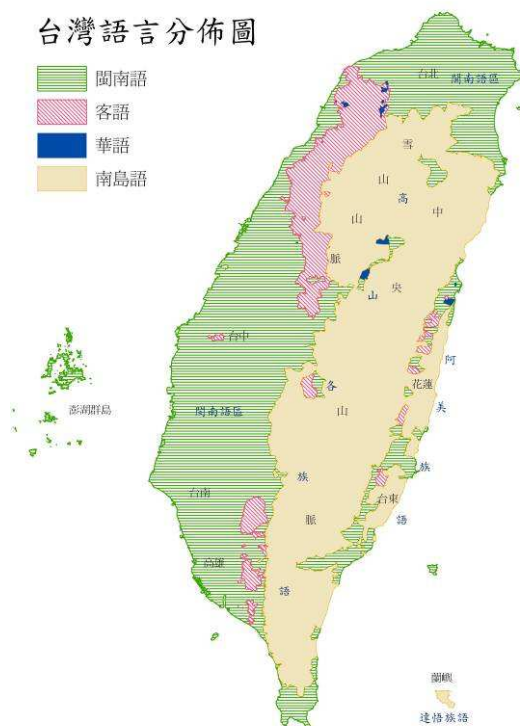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Bloomfield, *Language* (1933) 第 18 章插圖)

2.2.3 台灣南島語被包抄論

右圖【附圖 6】〈台灣語言分佈圖〉是現代台灣的語言分佈的現狀。圖中顯示，漢語的閩南語（綠色部分）和客語（紅色部分）整個包圍著南島語（黃色部分）。從共時的表面分佈狀態來看，南島語分佈在中央，漢語分佈在周邊。按照柳田的「方言周圍論」或柴田的「周邊分佈原則」，可以推斷南島語是新插入的，而漢語才是原住民族。不過事實剛好相反。

眾所周知，十七世紀初期漢人開始入侵台灣以前，台灣全島是南島語的分佈區。漢人移墾台灣的初期階段，漢語的分佈還處在「插入型」的階段。漢人移墾台灣雖然從台南開始，但不是單點插入，而是紛紛由西部港口多點入侵。隨著漢人地盤不斷擴張，點

台灣語言分佈圖



【附圖 6】台灣語言分佈圖

資料來源：洪惟仁繪製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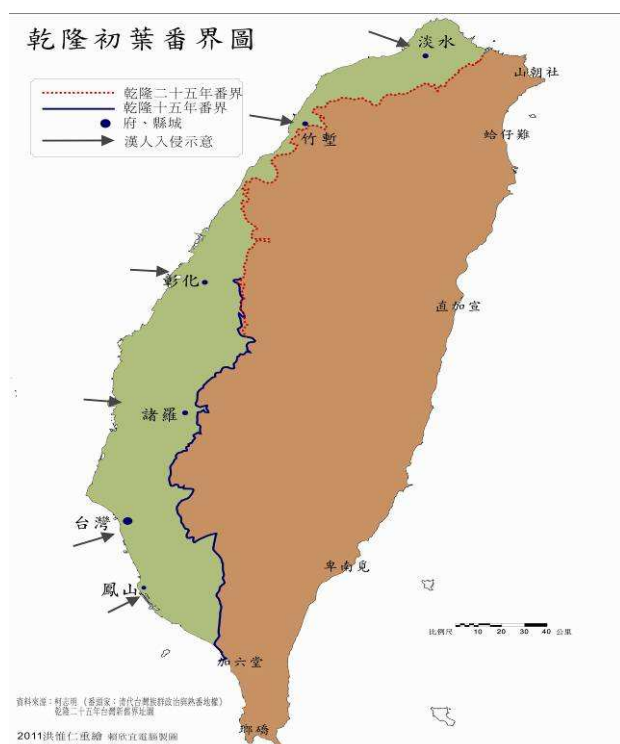
連成面。

【附圖 7】「乾隆初葉番界圖」是乾隆十五年（1750）及二十五年（1760）所劃訂的「番界」，番界以西是漢語區，番界以東是南島語區，顯示到了十八世紀中葉，台灣的半壁江山已經被漢人所佔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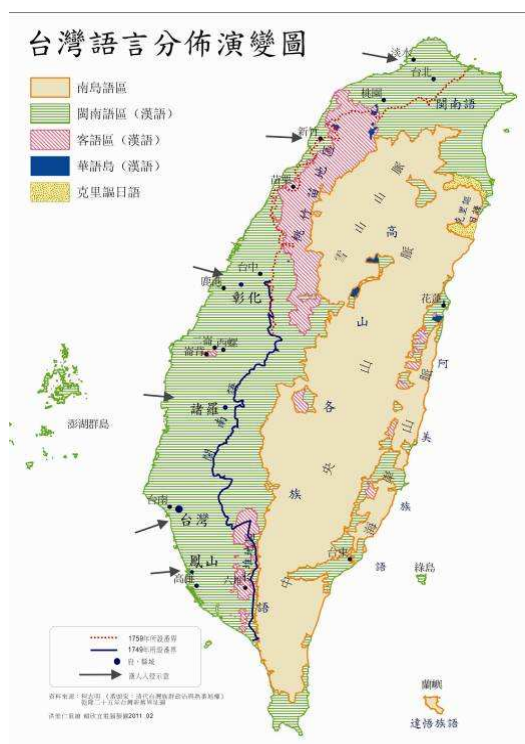
到了清末，整個西部和宜蘭已經全部被漢人所侵佔，東部花東地區也在漢人掌握之中。小川尚義（1907）【附圖 9】的地圖所顯示的是日治初期漢人擴張的範圍。【附圖 10】（小川尚義等 1935）顯示到了日治時期中葉，東海岸花東地區已經全部屬於漢語優勢區。整體而言南島語分佈和【附圖 7】顯示的現代原住民分佈情形已經很接近了。

【附圖 6】是作者經過實際調查所獲得的台灣現代語言分佈圖，顯示著原住民的南島語主要分佈區被漢語包圍在中央山脈和雪山山脈的高山地帶之中；平地的阿美族分佈在海岸山脈兩邊山麓的海邊或河邊，被漢語切斷了和其他高山族的連續性。

假使我們把清代以來不同時代的語言分佈圖排列起來，如下圖所示，由漢語的入侵，到乾隆時代的番界設置，到現代，南島語的分佈區一直在萎縮之中。



【附圖 7】乾隆初葉台灣番界圖
資料來源：根據柯志明《番頭家》（2001）附圖重繪（洪惟仁 2011）



【附圖 8】乾隆時期的番界與現代語言分佈圖套疊
資料來源：台灣現代語言分佈圖（洪惟仁 2011）套疊

由上圖可見分佈在「周邊」的漢語台灣的漢語正如羅馬尼亞周邊的俄語與匈牙利語一樣是新插入的語言。漢語入侵台灣之初被南島語包圍，屬於插入型的語言，但由於強勢的語言競爭力，逐漸發展為和南島語平分秋色（如【附圖 7】所示），最後包抄了南島語（【附圖 6】，並參照【附圖 8】）。也就是說位於中央的南島語才是原住民的語言，而周邊的漢語

是插入的新語。分佈於台灣中央地帶的南島語是漢語語言地盤發展的「洪水效應」所造成的孤島。

因此我們無法根據漢語和南島語共時的地理分佈狀態，判斷分佈在中間的語言屬於插入型或包抄型，這個工作只有求助於歷史記載的語言發展。

3. 討論與結論

3.1 有關「周邊分佈原則」的討論

柳田國男的「方言周圈論」(1930)並沒有把「古語在周邊」看成是語言地理分佈發展論的「原則」，只是一種現象。柴田武(1969:32)接受了「方言周圈論」，並且作為他語言分佈理論的第二原則「周邊分佈原則」。但是所謂「原則」是什麼意思？是否等於物理學所謂的「定理」(law)、青年語法學派所謂的「定律」(law)呢？如果是的話，那是不能有例外的，只要有一個例外，那就不能成立為「定理」或「定律」就不能成立。柴田武(1969:32)就「周邊分佈原則」有兩點說明：

1) 由地理分佈推斷語言發展的歷史，有一個前提，就是語言的傳播必須沿著地面爬行。(柴田武 1969: 28-29)

2) 也可能有周邊為新語，而中央為舊語的情形，但是機率很少。(柴田武 1969: 32)

根據說明 1)，不沿地面的遠距傳播，如移民所產生的錯雜分佈，以及如火星般飛散各地的標準語變體之類的傳播不在本原則涵蓋之內。不過既已在新地點落地生根，並向周圍傳播，即可適用這個原則。

根據說明 2) 所謂「周邊分佈原則」是可以允許「例外」的，只是這種例外很少發生。就一點才是根本問題。根據這個說明，這個原則不是「定理」，只是一種「傾向」(tendency)。這說明了柴田心目中的「原則」相當於語言類型學 (typological linguistics) 所謂的「類型」(type)。

這樣分析起來，我們不妨把所謂「方言周圈論」或「周邊分佈原則」看做是一種語言地理分佈發展的「類型」。我們把語言地理分佈發展分成兩個類型：即「插入型」與「包抄型」。「方言周圈論」或「周邊分佈原則」可以定性為「插入型」發展的理論。

3.2 地理分佈發展類型及語言地盤的消長

柳田提出「方言周圈論」時並沒有說是言地理分佈發展的「原則」，Bloomfield 在 *Language* (1933) 書中同時舉了一個插入型和一個包抄型的例子說明，他應該只是根據歷史事實指出語言空間分佈的發展模式有「插入型」和「包抄型」兩種類型而已。本文所採取的就是這個立場。

本文在 2.1 節舉例支持「方言周圈論」的主張：「古語殘存於周邊」。但是我們也提出「洪水論」，認為「插入型」的語言如果夠強勢，不斷擴張語言地盤，最後可能旋轉乾坤，新語與舊語割據天下，繼續擴張，發揮「洪水效應」，最後演變為「包抄型」。當然如果入侵的語言不夠強勢，或競爭優勢的時間不夠長，無法發揮「洪水效應」，將可能一直處於

被包抄的狀態，甚至於由包圍別的語言落得被別的語言包圍，語言地盤越趨萎縮，終至於在地圖上消失。

2.2 節並舉了兩個例子，描述了「包抄型」發展的類型，證明周邊的語言可能是新語，但也可能是舊語。「包抄型」的發展類型當然不止這兩種類型，我們還可以舉更多的例子，並且涵蓋了方言地理學或地理方言學兩個範疇。

我們認為，所謂「插入型」、「包抄型」是語言分佈區發展的兩種模式，「插入型」與「包抄型」不是互相對立的類型，寧可說是一種連續體，並且屬於不同的發展階段。柳田國男（1930）的「方言周圈論」或柴田（1969）的「周邊分佈原則」只能解釋插入型語言發展的初期狀態，不能解釋語言空間發展的所有事實。

當共時的語言地理分佈呈現 a-b-a 的表面狀態時，b 可能是古語，也可能是新語，語言地理學沒有辦法作出判斷。那麼語言地理學發展論變成只是一種「洞察力」，而沒有證明力，語言地理學不得不和其他領域進行跨領域合作，才能得到確實的證明。本文提出它和歷史考證的跨領域互動作為實例。

參考書目

Bloomfield, Leonard.

1933. *Languag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reprinted in 1962.

Brewer, Warren A. (卜溫仁)

2008, *Mapping Taiwanese*. 南港：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

Dauzat Albert 原著、松元秀治譯

1938, 《言語地理學門》，東京：富山房。

David Crystal 原著、風間喜代三、長谷川欣佑譯

1992, 《言語學百科事典・言語及其特徵・地理特徵》pp.33~50, 東京：大修館書店。

Eugenio Coseriu 原著、柴田武、賀登崧共譯

1984, 《言語地理學入門》，東京：三修社。

Grotaers, W. A.

1994, 《中国の方言地理学のために》，岩田禮日譯，好文出版。

2003, 《漢語方言地理學》，石汝杰、岩田禮中譯，上海教育出版社。

Labov, William, Sharon Ash and Charles Boberg.

2006. *The Atlas of North American English Phonetics, Phonology and Sound Change: A Multimedia Reference Tool*.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Weinreich, Uriel.

1954, Is a structural dialectology possible? *Word* 10:388-400, Reprinted in J. Fishman. (ed.) 1968. *Readings in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Hague: Moulton.

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編

1987,《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朗文書局。

李壬癸

1997,《台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台北:常民文化事業出版。

1999,《台灣原住民史:語言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

2004,〈台灣語言學先驅—小川尚義教授〉,初版刊《國語日報·書和人》第 1004 期(2004, 5/22)。

2004,〈台灣南島民族遷移圖〉,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繪製。

李仲民

2009,《從地理語言學論台灣閩南語語言地圖的編製觀念與方法—以台灣東北部閩南語研究為例》,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周振鶴

1996,《現代漢語方言的歷史背景》,《歷史地理》第九輯 pp.69~80。

岩田禮

2009,《漢語方言解釋地圖》,東京:白帝社出版。

2011,《漢語方言解釋地圖(續集)》,東京:好文出版。

柳田國男

1930,《蝸牛考》,刀江書院。

洪惟仁

1992,《台灣方言之旅》,台北:前衛出版社。

2002,〈台灣的漢語方言地理學〉,收入馬瀨良雄監修、佐藤亮一、小林隆、大西拓一郎合編《方言地理學の課題》pp, 127-137,東京:明治書院。

2009, 7/4,〈台湾の言語地理学はどこまで進んだか?〉,天理大学・天理台湾学会第 19 回研究大会論文。

2010.〈台灣地區的語言分佈〉,《敲開語言的窗口:華語的使用現象(情況與調查)》,馬來亞大學,馬來西亞語言暨應用語言學系學術論文系列(二),聯營出版(馬)有限公司出版。

2010, 11/21-22.〈台灣的語言地理:不連續分佈的解釋〉,北京語言大學・首屆中國地理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2011, 04/15-17. 'The flood effect in Language Wars in Taiwan.'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56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Linguistic Association.

2012, 4/26.〈方言競爭與方言融合:從閩南語方言地理學談語言分佈理論〉, Academia Sinica :First Congress on Taiwan Studies (FCTS)

洪惟仁與張素蓉合撰

2008,〈台中縣海線地區泉州腔的漸層分布——一個社會地理方言學的研究〉,載《社

會語言學與功能語法論文集》pp, 13-43, 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洪惟仁與簡秀梅合撰

2007, 〈關廟方言區「出歸時」現象的漸層分布：一個社會地理方言學的研究〉, 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語言微觀分佈國際研討會(2007, 9/28~29)。

柴田武

1969, 《言語地理学の方法》, 筑摩書房。

馬淵東一

1954, 〈高砂族の移動及び分布〉, 《民族學研究》18.1-2:123-154, 18.4:23- 72。

馬瀨良雄

1993, 《言語地理學研究》, 東京：櫻楓社。

馬瀨良雄監修、佐藤亮一、小林隆、大西拓一郎編集

2002, 《方言地理學の課題》, 東京：明治書院。

涂文欽

2009, 《彰化縣閩南語方言音韻的類型與分佈》, 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其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素蓉

2006, 《台中縣海線地區泉州腔的漸層分布》, 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其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曹志耘

2008, 《漢語方言地圖集》(三卷), 北京：商務印書館。

德川宗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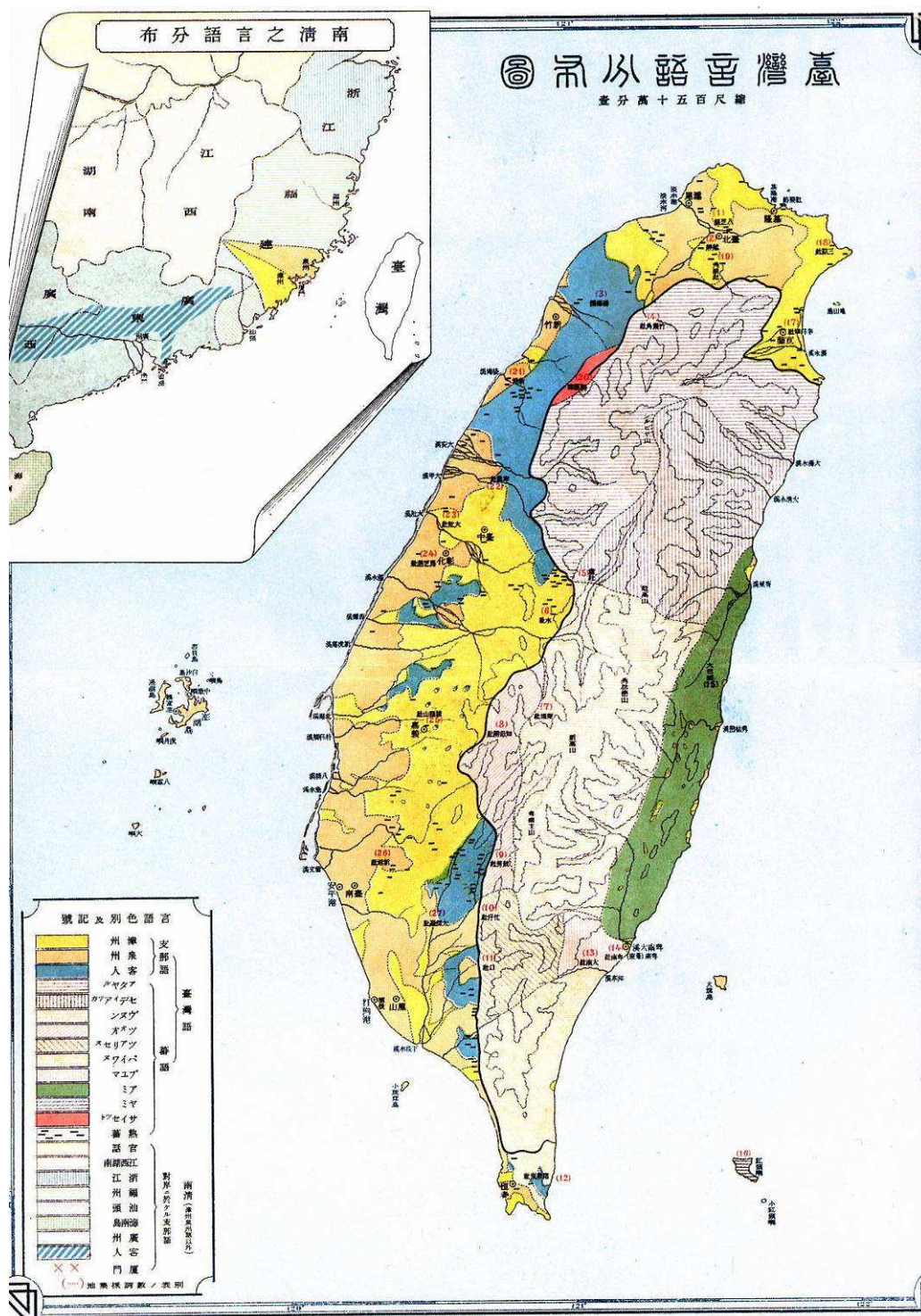
1993, 《方言地理學の展開》, 東京：ひつじ書房。

1993, 《日本の方言地図》(21版), 東京・中央公論社「中公新書 533」。

橋本萬太郎

1978, 《言語類型地理論》, 東京：弘文堂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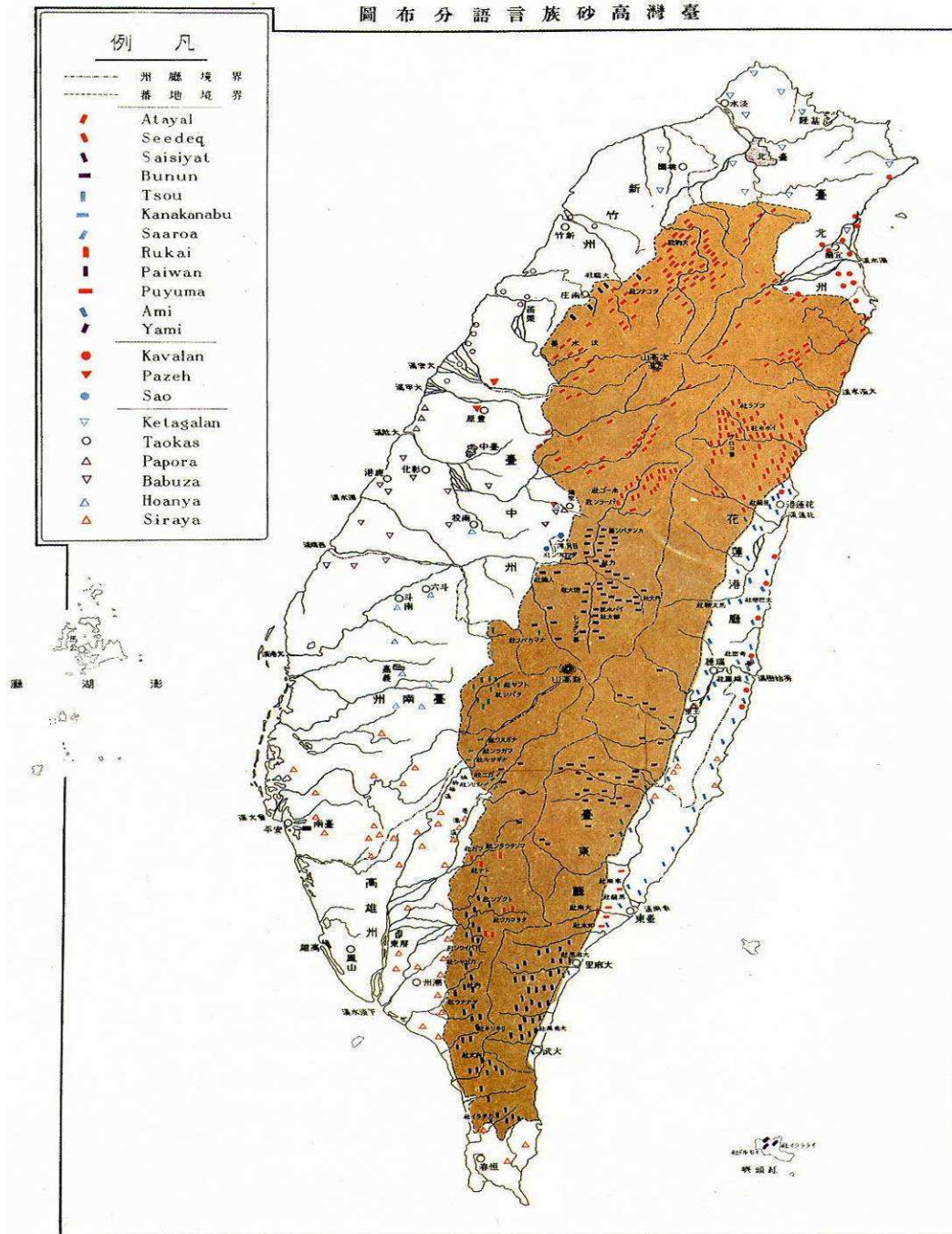
1981, 《現代博言學》, 東京：大修館書店。



【附圖 9】小川尚義「臺灣言語分布圖」

資料來源：《臺日大辭典》（1907）所載。

圖布分語言族砂高灣臺



【附圖 10】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台灣高砂族言語分布圖〉

資料來源：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説集》(1935)所載